

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文化及其 与甘青地区的联系^①

石 硕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成都, 610064)

内容提要: 石棺葬文化是继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后, 藏彝走廊地区所发现的最重要、最普遍的考古遗存。本文主要从藏彝走廊石棺葬文化的特点、时代及考古学内涵等方面对其来源问题特别是与甘青地区的联系作了初步的讨论。

关键词: 藏彝走廊 石棺葬 甘青地区

“藏彝走廊”系指今川、滇西部及西藏东部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该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 形成若干天然河谷通道, 自古以来即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迁徙流动的场所以, 也是西北与西南民族沟通联系的重要孔道, 故成为我国一条重要的民族走廊。因藏族、彝族为今天该走廊中两个主体民族, 故费孝通先生将之称作“藏彝走廊”^②。

藏彝走廊地区保留着大量古老的历史遗留, 在众多历史遗留中, 分布地域甚广并具有显著特点的石棺葬文化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可以说, 继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后, 藏彝走廊地区所发现的最重要、最普遍的考古遗存即是一种被学术界称作“石棺葬”的墓葬文化。所谓“石棺葬”, 又被称作“石棺墓”、“石板葬”或“石板墓”^③, 是一种以石板或石块垒砌墓室为主要葬制的考古文化遗存。由于藏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存在着密切联系^④, 加之石棺葬式在甘青地区也有发现且出现的时代相当早, 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⑤, 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多有学者认为藏彝走廊的石棺葬是由甘青地区传播和发展而来^⑥。那么, 这一看法是否成立? 本文拟着重从藏彝走廊石棺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藏彝走廊的民族互动与文化发展”[05AMZ002]的阶段性成果。

②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③ 陈祖军:《西南地区的石棺墓分期研究——关于“石棺葬文化”的新认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④ 参见石硕:《藏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类型及其与甘青地区的联系》,载《巴蜀文化研究》(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5月。

⑤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98年第5期。

⑥ 参见陈德安:《试论川西石棺葬文化与辛店文化及“唐汪氏”陶器的关系》,载《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

葬文化的基本特点、时代及考古学内涵等方面对此问题作一讨论。

一、石棺葬在藏彝走廊的分布与特点

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发现可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1938 年，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在岷江上游今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进行调查时，曾发现和清理过一座石棺葬残墓，写成《汶川县小寨子残墓发掘记》，于 1951 年发表于成都《工商导报》^①。这是考古学专业学者对该区域石棺葬开展调查研究的一个开端。1944 年，美国学者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葛维汉（D. C. Graham）也曾报道过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的分布、墓葬结构和出土文物。1964 年，四川大学童恩正赴岷江上游的茂县、汶川、理县等地作考古调查，在当地清理和发掘了 28 座石棺葬，并将此次清理情况与 1938 年冯汉骥先生清理的资料合并，写成《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一文，发表于《考古学报》1973 年第 2 期。这是首次对岷江上游区域的石棺葬这一重要考古文化遗存作了较系统的介绍，也使石棺葬这一独特考古遗存逐渐为学术界所认识。

此后，除了岷江上游地区外，石棺葬墓群在藏彝走廊的其他地区如澜沧江上游、金沙江上游流域、雅砻江流域、大渡河中上游流域、青衣江流域以及滇西北和滇中地区也大量被发现。

这些石棺葬墓地多集中分布于藏彝走廊区域各个河流台地上，墓地中石棺葬均呈密集排列，或数十座、数百座乃至数千座不等。许多石棺葬墓地不仅规模极大，墓葬数量众多，且石棺葬地点在藏彝走廊区域的分布范围也极为广泛和普遍。因此，可以认为，石棺墓葬是继新石器时代以后整个藏彝走廊地区最主要的一种考古文化遗存。

需要指出，以石板或石块垒砌墓室的石棺葬并不是藏彝走廊地区独有的葬式，事实上，石棺葬式在我国的东北、华北北部及西北的甘青地区均有发现。童恩正先生在《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中，曾对广泛分布于我国从东北、西北到藏彝走廊地带的石棺葬进行过一些比较和讨论。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此广袤的地域之内，石棺葬又有地区的差别。每一局部地区的石棺葬均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同的民族集团相联系。”^② 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东北、西北和藏彝走廊这三个石棺葬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中，藏彝走廊地区可以说是石棺葬分布数量最大、最密集和最普遍的一个区域。

迄今为止，在藏彝走廊区域经正式发掘的石棺墓地已有近 40 余处，约 700 座墓葬。此外，还调查核实了一大批墓地。根据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发掘情况及有关研究，目前可以初步确认以下几个事实：

第一，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主要流行年代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汉末年，目前在藏彝走廊地区发现的绝大部分石棺葬均属于这一年代范围。在东汉以后，石棺葬这种

^① 该文发表于 1951 年 5 月 20 日成都《工商导报》。

^②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

独特葬式在藏彝走廊地区大幅度减少或渐趋消失，所以，东汉以后的石棺葬已极为罕见。目前仅发现有极个别和零星的几座属于唐至元明时代的石棺葬，但这些石棺葬主要为火葬墓，即焚尸后葬骨，可视为仅保留了石棺葬式而已的火葬石棺墓，实际上只是东汉以前所流行的石棺葬一些零星的残余形式。所以，石棺葬的主要流行时代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时期，进入东汉以后，石棺葬开始呈现衰落之势。

第二，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这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以石棺为葬式，这一独特形式的古代墓葬虽然目前在我国的东北、内蒙古、陕西、新疆均有发现，但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来看，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明显不同于东北、西北及其他地区石棺葬的特点，而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其二，分布于藏彝走廊各地的石棺葬无论是川西高原、滇西北或藏东地区，虽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并可据其差异划分为不同的地方类型，但与这种差异相比，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共性则更为突出。目前，在各地石棺葬随葬器物中，皆以陶器中大双耳罐、单耳罐、小平底罐，铜器中的曲柄剑、扁茎无格短剑、三叉格剑、小铜刀、圆形饰牌为其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也就是说，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共性要大于其差异性。因此，罗先生认为，从考古学的文化定义看，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可以说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第三，与东北、西北及其他地区的石棺葬相比，藏彝走廊是目前国内石棺葬墓地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区域。这也足以说明，在新石器时代至东汉时期，石棺葬既是生活在藏彝走廊地区的古代人群普遍采用的葬俗和埋葬方式，也是他们留下的主要考古文化遗存。

由于目前在藏彝走廊地区发现的石棺葬数量巨大、分布密集，几乎遍及了整个藏彝走廊区域，同时由于整个藏彝走廊区域的石棺葬不仅存在着明显的共性，而且年代跨度极大，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东汉，时间延绵达 2000 余年。因此，从很大意义上说，石棺葬既是我们认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东汉这一时期藏彝走廊地区古代人群之历史文化面貌的基础，同时也是我们揭开古代藏彝走廊人群系统及族属源流的一把钥匙。

二、关于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文化性质与来源

石棺葬既然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汉时代藏彝走廊地区古代人群所普遍采用的埋葬方式，并且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又有着突出的共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是什么样的古代族群或民族集团的遗留？他们是当地的土著人群还是外来迁入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来源。

有关藏彝走廊石棺葬的来源问题，在学术界一直颇存争议。其中较流行的看法是普遍倾向于将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起源同外来人群相联系。学术界最早有关石棺葬来源的认识和争论主要围绕岷江上游石棺葬来源而展开。早期冯汉骥先生曾提出过“月氏说”，认为该地区的石棺葬是由西北南下的月氏人所遗留。^①但长期以来最流行的观点则是将石棺葬同由西北南下的古羌人相联系，认为石棺葬主要是由自西北南下的羌人所

^① 冯汉骥：《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载《成都工商导报》，学林副刊 1951 年 5 月 20 日。

带入藏彝走廊地区的，是古羌人的遗留。^①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发现资料的不断积累和丰富，对该地区石棺葬来源的认识也不断得到深化并取得了新的进展。不少学者开始提出并认同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主要是当地土著人群之遗留的观点。如罗开玉先生在《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葬研究》中即明确提出：“过去学术界大多将川滇西部及藏东的石棺葬与外来民族相联系。最常见的说法，认为石棺系西北南下的羌人的遗留。我认为西南石棺曾受到古代西北文化的若干影响，它的出现与西北石棺葬俗有关，但从大量考古资料看，它主要是土著民族的葬俗。”^②

笔者认为，要真正解决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来源问题，史料文献的记载往往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只能起参考和辅助的作用，关键还是要立足于从考古发掘资料方面对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认识和理解。

迄今为止，综合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发掘资料，至少有以下几个突出现象有助于我们对石棺葬来源的认识：

首先，藏彝走廊地区的一些早期石棺葬在文化内涵上往往直接与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相衔接。其次，从对石棺葬的分期来看，从第一期至第六期即从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汉以前，石棺葬在藏彝走廊地区乃呈现出了一个绵延持续和未曾中断的发展序列。它的上限直接与当地新石器文化相衔接，下限则主要迄于东汉。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这一自成序列且绵延时间极长的时代特点，显然很难将其与某一外来民族相联系，故罗开玉先生在《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一文中即明确提出：“我认为西南石棺曾受古代西北文化的若干影响，它的出现与西北石棺葬俗有关，但从大量考古资料看，它主要是土著民族的葬俗”^③。

据罗开玉对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分期研究，目前可确定的早期石棺葬主要有滇中部偏北地区的永仁永定磨盘地 30 座墓，永仁维的 60 座墓，元谋大敦子 5 座墓，下棋柳 1 座墓；岷江上游地区茂汶撮箕山墓地中的早期石棺墓及大渡河、青衣江流域地区的汉源大窖 1 座墓。这些石棺葬的主要特点是不见金属器，陶器火候低且均为手制，滇中部偏北地区石棺葬中已出现双耳罐、单耳罐等陶器，而岷江上游则主要是小平底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的石棺葬不仅大多位于新石器时代遗址附近及边缘，而且石棺葬中所出土器物与附近新石器遗址中所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一致。如永红永定磨盘地的 30 座石棺墓距菜园子新石器遗址约 30 米，在距元谋大敦子新石器遗址约 50 米处也发现了 5 座石棺墓。这些石棺葬所出陶器、石器与附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器物在质地、形制和制作技术方面完全一致。如永红菜园子石棺葬墓地出土的陶瓶、罐等器物分别与元谋大敦子遗址所出同类器物一致。这些石棺葬的年代不但与新石器遗址的年代大体同时，而且二者应属于同一文化序列。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分布在新石器遗址附近的石棺葬很有可能就是当时遗址居民的墓葬。据对元谋大敦子遗址 T5 柱洞内木炭碳 14 测定，其年代为距今 3210 ± 90 （半衰期为 5730 年），树轮校正为距今 $3420 \pm$

① 参见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载《考古学报》，1973 年第 2 期。

②③ 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 年第 4 期。

155。这就意味着元谋大敦子及永红菜园子等新石器遗址周围的石棺葬的年代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相当于中原夏商时代，即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1 世纪。^①

石棺葬与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器物相同的情况还见于四川汉源大窖的石棺葬。在汉源县大树公社大窖五队发现的一座石棺葬中，出土了一件造型独特的陶双联罐。此种类型的双联罐不仅见于藏彝走廊地区的西藏昌都卡若和西昌礼州这两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同时在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房基遗址、宝鸡竹园沟西周墓也有发现。罗开玉根据此墓的石棺结构与滇西早期石棺葬相同，又出土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独特器物，故将其年代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岷江上游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如茂汶撮箕山早期石棺墓所出陶器，亦与广汉三星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殷代地层中所出的陶器相似。很显然，藏彝走廊地区早期石棺葬在文化内涵上直接与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相衔接，其所出陶器、石器也与当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所出同类在质地、形制、制法相一致的情况，说明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与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存在明显传承关系，因此，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源头是直接根植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就是说，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并非是由所谓外来人群带入的。事实上，藏彝走廊地区使用石棺葬的人群显然应该是自新石器时代起就生活在当地的原始居民。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为什么不采取其他葬俗而唯独采取了“石棺”这样一种独特葬俗？“石棺”蕴藏着什么样的文化意义？事实上，假如我们将视野拓展开去并仔细观察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即不难发现，石棺葬的萌芽实际上已经孕育在此前藏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之中。在距今 5300 年~4000 年的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遗址中，曾发现实际用途不明，且令人费解的石砌建筑遗迹。它们分别是三段用砾石垒筑的石墙，两座用大块砾石垒筑的圆石台和三处用石头垒砌成的石围圈。三段石墙中，有两墙平行成同一走向，两墙间隔 4 米左右，两墙均长达 15 米左右，宽为 1 米~2 米。因墙有倒塌，残高仅 0.25 米。发掘报告称“此两墙的关系和作用不明确”^②。另一段石墙则呈南北向，墙的北端已遭破坏，但现存部分保存较好，长 8.6 米，宽 2 米（以底部计算），现存高度为 0.7 米~0.8 米。这三段石墙的垒筑方法均是将大块垒于墙外，将较小的砾石和碎块填于墙内，石墙缝隙内均未见草泥等黏合剂。对这三段石墙的实际用途，目前还不甚明了。这三段石墙遗迹足以说明卡若遗址的居民已使用着较为普遍和娴熟的石砌技术。能在自己居住的聚落内用砾石块垒砌出长达 15 米，宽达 2 米，高达 0.8 米的数条石墙，且不使用任何黏合剂，足见卡若居民的石砌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点，从卡若遗址中还同时发现 F5、F12、F30 三座石墙垒筑的半地穴房屋和两条石铺道路的遗址均可得到很好的佐证。对这三段石墙还有待进一步认识。不过，最值得关注的却是卡若遗址中出现两座圆石台和三处石围圈遗迹。两座圆石台均用大块砾石垒筑，中间用小砾石及碎石块填充，缝隙内无黏合剂。一座圆石台的直径 2 米，高 0.23 米，另一座直径 1.5 米，高 0.25 米。三座石围圈，“其共同特点是半地穴建筑，平面呈圆形，面积不超过 6 平方米，周围均为砾石垒

① 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 年第 4 期。

②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 46 页。

筑的石墙。由于面积很小，又无柱洞、烧灶、门道和居住面等迹象，也未发现任何遗物，用途不详”^①。目前对卡若遗址中出现的这些圆石台和石围圈的实际用途尚不清楚。由于在藏彝走廊其他地区新石器遗址中尚未发现同类石砌建筑遗迹，因此难以参照和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不过，主持卡若遗址发掘的童恩正先生给出一个解释，认为“圆石台，石围圈等可能和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在全国其他原始文化中不多见”^②。笔者认为，此解释有较大的合理性。由于圆石台和石围圈均可排除是遗址中房屋建筑的附属部分，又谈不上任何实际用途，因此，它们极有可能是与卡若居民的原始信仰及精神活动有关的建筑遗迹。倘若如此，我们至少可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从卡若遗址中发现的众多石砌建筑遗迹看，卡若遗址的居民是擅长于石砌建筑的人群。第二，石砌建筑已经同卡若原始居民的原始信仰及精神生活发生了某种联系。也就是说，从圆石台、石围圈这类可能与原始宗教有关的石砌建筑遗迹看，在他们的原始信仰和宗教观念中可能已包含了某种对“石”的独特理解或崇拜。

事实上，我们有同样的理由认为，藏彝走廊地区最初创造和使用“石棺”这一独特葬俗的人群，起码应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们应是擅长于石质建筑的人群，因为石棺的制作与垒砌均要求有较高的石建技术。第二，“石棺”这一独特葬俗的产生，最初肯定同人们的宗教观念及原始信仰有直接关系。当缘于他们宗教观念中对“石”的一种独特理解或崇拜。所以，从这两点来看，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显然出现于距今 3000 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但石棺葬的文化因素却早已酝酿和孕育在该地区此前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中。对卡若遗址中出现的石墙半地穴房屋、石墙、圆石台、石围圈、石铺路等众多石砌建筑遗迹，发掘报告指出：“它们似乎开创了一种石砌建筑的新时期。”关于卡若文化石砌建筑对藏彝走廊地区产生的影响，发掘报告中还作了这样的论述：“卡若文化对这一地区（指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区域——引者）的影响，甚至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也能看到。在今西藏及川西高原地区藏、羌、嘉戎等族居住的范围内，各种建筑中仍然广泛使用砌石技术，而主要的住宅形式则是一种石墙平顶的方形两层房屋，称为‘碉房’，此种传统在史籍中历代均有记载。卡若建筑遗存的发现，使我们能够将它的历史上溯到新石器时代。”^③这段论述极富洞见。事实上，从很大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在藏彝走廊这一独特地理区域中，距今 4000 多年前，卡若文化中众多石砌建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东汉大量存在的石棺葬以及历史时期该地区普遍盛行的石砌碉房、碉楼，三者不仅有紧密内在联系而且一脉相承，呈现出一个清晰的石砌建筑传统的发展演变脉络。若把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放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文化主要是从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它与当地新石器文化不仅相互连接，而且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

①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7页。

②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③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51页。

罗开玉先生在《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葬研究》一文中，曾根据碳 14 测定数据、随葬器物的特点与变化以及墓葬的整体面貌、类型等因素，对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年代作过系统的分期，初步将其分为以下八期：

第一期，无任何金属器、出土的陶器、石器与当地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同类器物的质地、形制、制法一致，在当地尚未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该期的时代约当于中原夏商时期，即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1 世纪。

第二期，出现小件青铜器，处于青铜时代早期，其时代约在商代末到西周中晚期。

第三期，出现小件铁器，其时代约从春秋到战国中晚期之际。

第四期，主要特征是出现秦半两，时代约从公元前 310 年迄于初汉。

第五期，主要特征是见汉初半两，时在武帝铸五铢钱（公元前 120 年）之前，即西汉早期。

第六期，流行西汉五铢，时值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初。

第七期，流行东汉五铢和使用东汉砖，时在东汉至南北朝初期。

第八期，从出土的陶器瓷器、货币及其他资料看，主要在唐宋时期。

从罗开玉据以分期的石棺葬材料来看，石棺葬在藏彝走廊地区的主要流行时代是在东汉以前，亦即罗所划分的第一期至第六期。迄今为止，藏彝走廊地区发现的 90% 以上的石棺葬均属这一年代范围。而罗开玉所分的第七期即出有东汉五铢和东汉砖的石棺葬，目前仅发现于藏彝走廊东部边缘的四川雅安保兴县境内。第八期的资料则更少，目前仅存茂县三龙 5 座墓^①，滇西北保山鸭子塘山东麓 1 座墓^②。

根据上述分期，罗开玉指出：“除第八期资料较少以外，第一期至第七期的资料基本上是衔接不断的。”^③ 虽然第七期即东汉石棺葬已趋向衰落，目前仅在保兴县有发现，已不具有多少代表性。但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从第一期至第六期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汉末年和东汉初，石棺葬在藏彝走廊地区实际上呈现了一个绵延持续和未曾中断的发展序列。既然石棺葬在藏彝走廊的发展呈现了一个完整和相互衔接不间断的年代序列，显然就很难将其与某一外来民族相联系。因此，罗认为：“从大量考古资料看，它主要是土著民族的葬俗。”^④ 童恩正先生对石棺葬研究的结果，也得出了相同的看法：“过去我们曾认为：‘石棺葬的建造者在此居留的时间不会太长，而占据的地域亦不甚广阔，似乎是一种突入的民族。’实际上，石棺葬是川西北地区分布甚广，延续时间很长，影响较大的一种土著民族所创造。”^⑤ 并认为石棺葬：“应视为本地区主要的一种土著民族的遗留”。

① 高维刚：《茂汶羌族自治县元、明时期的石棺葬》，载《四川文物》，1985 年第 3 期。

② 保山市博物馆：《保山新发现的石棺墓沙灰古墓清理简报》，载《云南文物》，1985 年第 18 期。

③④ 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 年第 4 期。

⑤ 童恩正：《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氏族的几个问题》，载《思想战线》，1978 年第 1 期。

三、藏彝走廊石棺葬与甘青地区的联系

尽管从文化内涵看，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主要渊源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还是与之衔接的石棺葬，显然都绝不是一个封闭和孤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因此，我们不能排除藏彝走廊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及诸多文化因素受到周边特别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文化的影响的可能性。特别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文化主流是直接渊源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系统。二者有共同的渊源，仅仅是在距今 6000 年前后才开始发生分化。这种局面可能导致甘青地区与藏彝走廊两地居民之间的交往联系不仅较为密切，而且是绵延不断的。这一点从石棺葬文化方面亦可得到印证。事实上，在石棺葬文化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藏彝走廊与甘青地区之间存在一些明显的共同因素。

首先，石棺葬在甘青地区也有发现，而且甘青地区目前发现的以石板和石块垒砌的石棺葬，其年代要早于藏彝走廊地区。目前甘青地区年代最早的石棺葬发现于青海同德县宗日新石器文化遗址中，该遗址的碳 14 测定年代在距今 5600 年至 4000 年，大体与马家窑文化同时。^① 由于宗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马家窑文化有明显差异，故有人主张将其视为一个与马家窑文化相并列的新文化，并命名为“宗日文化”^②。宗日遗址的石棺墓是用石板围成，“以修整套成长方形的石板构成四壁，安放于墓穴之间，均为底板，盖板或有或无”^③。在属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甘肃景泰张家台墓地中也发现 11 座无底石棺葬，墓葬形制结构与茂县撮箕山早期石棺葬较为相似，其年代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另外，在青海民和县簸箕掌、山城台、瓦窑台、祁家台、原土台等地也发现一批石棺葬，属于辛店文化甲组遗存，其时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

其次，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中的一些典型器物，如双耳罐、单耳罐等在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中也普遍存在。尤其是双耳罐，也是甘青地区四坝、卡约等文化中的常见器物。

那么，如何看待藏彝走廊地区与甘青地区在石棺葬方面存在的这些共同文化因素呢？首先，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目前甘青地区发现的石棺墓其年代要早于藏彝走廊地区。青海宗日遗址中的石棺葬年代至少在距今 4000 年以前，甘肃景泰张家台墓地石棺葬的年代与之大约相近，而目前藏彝走廊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棺葬仅为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即约距今 3000 年左右，较之于甘青地区约晚了 1000 余年。基于这一事实，童恩正对石棺葬这一葬式的发展源流作过如下推测和判断：

就现有资料而言，发现的石棺葬以西北最早，西南次之，东北又次。这三个大区虽然相隔甚远，但石棺的结构却惊人的相似。我们似有理由可以推测，石棺原为黄河上游某一氏羌系统的民族（其中以氏族的可能性较大）所采用的

①③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98 年第 5 期。

② 陈洪海、格桑木、李国林：《试论宗日遗址的文化性质》，载《考古》，1998 年第 5 期。

一种葬具，以后才传播到“西南夷”和东北的“胡”、“戎”诸民族中去的。^①

假如我们把上述论断中将“石棺”的使用确定为“黄河上游某一氏羌系统的民族（其中以氏族的可能性较大）”等这些主观成分去掉，那么根据目前石棺葬“以西北最早，西南次之，东北又次”来看，童恩正先生所作的“石棺”这一独特葬式最早起源于西北，而后才传播到西南的藏彝走廊地区和陕西、内蒙及东北地区的推测并非没有可能。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童恩正先生在上述论述中所说的并不是石棺墓葬本身，而只是石棺这一“葬具”形式的起源和传播，这是需要特别加以区分的。需要指出，目前除藏彝走廊和甘青地区外，虽然在我国吉林、辽宁、河北、内蒙、陕西等地均发现有青铜时代的石棺葬，但石棺葬的随葬品在不同地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与特点，应各自属于当地的青铜文化，并非同一种人群所遗留。我国吉林、辽宁、河北、内蒙、陕西等地的石棺葬式是否由甘青地区“传播”过去的，因情况较为复杂，这里暂不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这一独特的葬式最早是否起源于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

首先，从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和甘肃景泰县张家台墓地这两处目前甘青地区年代最早的藏彝走廊发现遗址来看，石棺葬式在这两处遗址中均不是唯一葬式，而是与土坑墓、木棺墓或瓮棺墓同时并存。如在宗日遗址已清理的 222 座墓葬中，除石棺葬具外，墓地中还存在着有木椁、木棺和瓮棺等葬具，同时也有土坑墓。^② 甘肃景泰县张家台墓地中，除石棺墓外，也有木棺墓和土坑墓。从这两个遗址的情况可以说明，当时尽管黄河上游的原始人群已开始使用石棺这一独特葬具，但尚未成为一种普遍的葬式，仅仅是与其他如木棺、木椁、瓮棺、土坑墓等葬式相并存的一种，这可能反映了石棺葬式的一种早期萌芽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在甘肃景泰张家台墓地发现的 11 座石棺葬中，有 7 座是小孩墓葬，仅 4 座为成人墓葬。石棺的形制也普遍偏小，小孩墓棺长 0.45 米~0.82 米，宽 0.31 米~0.50 米，高 0.20 米~0.30 米；成人墓棺长 1.02 米~1.31 米，宽 0.47 米~0.76 米，高 0.30 米~0.36 米。11 座石棺墓中除 1 座小孩墓是二次葬外，其余的均为侧卧屈肢葬。^③ 正因为人的埋葬呈侧卧屈肢葬式，故石棺的形制普遍偏小。此外，一座成人石棺墓的棺盖是一半铺板石一半铺木板，这反映当时石棺与木棺可能关系较密切。以上这些特点与藏彝走廊地区成熟的石棺葬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能反映当时的石棺葬式尚处于一种早期的发展状态。从这些情况来看，“石棺”这一葬式的最初使用是从甘青地区发源，后来逐渐传播到藏彝走廊地区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前面我们已经论证过，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源头是直接根植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即当地的石棺葬并非是由所谓外来人群带入，而是从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既然如此，又如何理解“石棺”的这一葬式最初是从甘青地区发源并逐步传播到藏彝走廊地区

①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②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98年第5期。

③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载《考古》，1985年第3期。

的这一可能性呢？事实上，假如我们从藏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系统是直接渊源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二者有着共同的渊源这一背景来考虑，问题就会变得明朗起来。首先，既然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出自同一系统，二者有着共同的渊源，那么可以肯定，产生“石棺”这一葬式的文化因素或者说“石棺”葬式的源头就应该同时孕育和存在于两地的新石器文化之中。就这一点而言，藏彝走廊地区在距今 5000 余年的卡若文化中出现的可能与某种原始信仰有关的圆石台、石围圈等石砌建筑遗迹，同甘青地区时代大体相当的宗日遗址中所出现的以小孩墓葬为主且形制普遍偏小的石棺墓，很大程度应视作同一性质的文化现象，反映两地新石器文化中均存在着某种明显与“石”相关联的文化因素。而甘青地区与藏彝走廊地区之所以同时存在这种共同的与“石”相关联的文化因素，很大程度显然缘于两地的新石器文化有着共同的渊源。从现有考古资料而论，既然石棺葬式在甘青地区出现的年代要早于藏彝走廊地区，因此，我们不能排除“石棺”这一葬式的最初使用是源自甘青地区，而后才传播到藏彝走廊地区的可能性。不过对于“石棺”葬式是否确由甘青地区传入藏彝走廊地区，从现有资料看，还仅仅是一种较大的可能性，尚难以得到确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石棺”葬式与作为考古文化遗存的石棺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石棺”作为一种葬式可以最早产生于某一地区，而后在不同地区或不同人群中得到传播和采用；但作为考古文化遗存的石棺墓却往往有着特定的内涵，大多与某一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的文化相联系。所以，尽管基于“石棺”葬式在甘青地区出现的年代早于藏彝走廊地区，基于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与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出自同一系统，二者有共同渊源之背景，我们不排除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这一葬式可能源自于甘青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墓葬是来自于甘青地区。事实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在甘青地区最早出现石棺葬的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和甘肃景泰张家台墓地这两处遗址中，其石棺葬中的主要随葬品均是有着浓郁马家窑和宗日文化风格的彩陶罐，这种彩陶罐无论就器形还是彩陶纹饰均与藏彝走廊地区早期石棺葬中所出器物相去甚远。所以，虽同是石棺葬，但两地石棺葬的文化内涵却有很大差异，缺乏文化系统上的必然联系。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对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与甘青地区诸原始文化所共同存在的一些典型器物如双大耳陶罐和单耳陶罐的仔细对比上，可得到更明确的认识。过去普遍认为，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中的一些典型器物如双大耳罐、单耳罐等在甘青地区的诸原始文化中也普遍存在，甚至是甘青地区诸原始文化中的常见器物，因而将此作为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是来自甘青地区或受甘青地区诸原始影响的主要证据之一。但是，近年宋治民先生在将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中出土的典型器物同甘青地区同类器物进行细致比较之后，得出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看法。通过对两地双大耳陶罐的比较，他指出：

双大耳陶罐为（藏彝走廊）石棺葬随葬陶器中主要的一种，以往都以为石棺葬的双大耳陶罐和西北地区的双耳罐有密切的联系，是（藏彝走廊）石棺葬来自西北或受西北某些文化影响的论据之一。但综观石棺葬所出最常见的双大耳陶罐为小口、短颈、鼓腹，双耳上起口沿，下接腹部，其弧度基本上是鼓腹向上伸延的曲线，因之双大耳特别突出，是其基本特征。这种双大耳陶罐和西

北地区的某些双耳罐有着明显的区别。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出有几种双耳罐，属于双大耳罐的有两类，不过这两类双大耳陶罐都是敞口高领，和（藏彝走廊）石棺葬中的双大耳陶罐明显不同。分布在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也有双大耳罐，其器形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的相似，也是敞口高领。其他如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卡约文化所常见的双耳罐以双小耳为主，耳均上起口沿下至肩部，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有双大耳者，但也是上起口沿下至肩部。……通过这些材料，可以看出石棺葬中所流行的双大耳罐和西北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卡约文化等并无直接的继承发展关系。^①

通过对两地单耳陶罐的比较：他指出：

单耳陶罐也是石棺葬中的最为普遍的陶器之一，在许多石棺葬中都有发现。这类罐的形式也比较多样，但耳从口沿向下弧转至腹部这种形式却占单耳罐的大多数，只有少数的耳处于肩腹部。另一个特点是不少单耳罐在耳的上部或肩、腹部带有乳丁纹的装饰，如营盘山、永芝、石底等地都有这种单耳罐。

单耳陶罐也是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流行的一种陶器。在马家窑、半山、马厂诸类型的陶器中有不少单耳罐，且有一些在耳的上部饰乳丁纹。但这些罐的单耳都是从口沿向下接至肩部，耳也较小。在客省庄二期文化和齐家文化中也都有单耳罐，单耳多为从口沿下接至腹部，有些和理县、汶川、茂汶石棺葬的单耳罐相似，其他辛店、寺洼、卡约诸文化单耳罐较少，不是代表性器物。如果说石棺葬中的单耳罐和西北地区某些文化有联系，那就只有客省庄二期文化和齐家文化，但是除了二者时代差距较大外，客省庄二期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单耳罐都无饰乳丁纹者。^②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到，尽管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中和甘青地区诸原始文化中均共同出有双大耳陶罐和单耳陶罐这类相似的典型器物，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仍是较为明显的。尤其重要的是，在两地的双大耳陶罐和单耳陶罐之间找不到直接的继承发展关系。

事实上，除宋治民先生所提到的上述差别外，两地的双耳陶罐还有一个显著差别：彩陶与非彩陶的差别。彩陶双耳罐是甘青地区最具特征性的器物之一，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诸文化中均普遍出有彩陶双耳罐。而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中虽出有双耳罐，但尚未见有施彩绘的双耳罐，其陶质陶色大多以泥质磨光黑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尤其是磨光黑陶双耳罐在川西高原一带的石棺葬中分布极为广泛，是川西地区石棺葬随葬陶器中最有特征性的器物。所以，彩陶与非彩陶，也是两地双耳罐的一个显著差别。

从目前的资料看，在与甘青地区原始文化比较上，至少有以下三个事实可有助于我们对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文化系统的认识：

第一，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极为盛行的彩陶并未出现在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

①② 宋治民：《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棺葬》，载《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

中，这表明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系统并不直接与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相衔接。

第二，藏彝走廊地区早期石棺葬中所出陶器、石器与当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所出同类器物在质地、形制、制法等方面基本一致，说明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在文化内涵上与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明显传承关系，应是从当地新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

第三，藏彝走廊是石棺葬的主要流行区域，其石棺葬的数量、墓地规模或分布范围均远远超过甘青地区。尽管甘青地区“石棺”葬式出现的年代早于藏彝走廊地区，但在甘青地区石棺葬的总体数量较为有限，并未成为一种主流葬式。而石棺葬却是整个藏彝走廊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后期至东汉早期的一种主流葬式，其延续的时代之长、发现数量之丰富、墓地规模之庞大及分布范围之广，都远非甘青地区所能比拟。从这一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排除藏彝走廊石棺葬由甘青地区大规模移入的可能性。

因此，笔者认为，甘青地区与藏彝走廊两地在石棺葬方面所呈现的一些共性，从根本上并不存在孰源孰流的问题，其真正的根源应在于藏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系统是直接渊源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二者之间原本就存在共同的渊源。因此，正如藏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本身即存在大量甘青地区的文化因素一样，事实上，石棺葬的文化基因早已同时孕育和存在于两地的新石器文化之中，且其端倪在新石器时代也已经显现，青海宗日遗址距今 5600 年~4000 年出现的以小孩葬为主且形制偏小的石棺墓，以及藏彝走廊地区卡若遗址中明显与某种原始信仰有关的圆石台、石围圈等石砌建筑遗迹等，都可视为是这种端倪的体现。所不同的是，由于两地的地质地貌及自然环境差异明显，石棺葬后来在两地的发展呈现了迥然不同的局面。藏彝走廊地区因地处高山峡谷区，岩层破碎和裸露面较多、叶岩丰富和易于取得石板材，此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石棺葬葬式在此得到极大发展，并成为该区域延续时代极长的一种主流葬式；而甘青地区因地势相对开阔平缓，且以草原和高原面为主，岩层裸露较少，取得石板材相对不易，虽然其石棺葬式的萌芽和产生较早，但其普及程度和数量却远不及藏彝走廊地区，亦未能在当地成为一种主流葬式。因此，从根本上说，两地石棺葬方面存在的许多共同文化因素和相似性，与其说是“源”与“流”的关系，不如说是同源异流所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两地的石棺葬都分别源自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各自从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们之间出现的相似性和一些共同文化因素，虽不排除有相互影响、交流的原因，但主要当源于两地新石器文化本身在系统上存在密切亲缘关系。

很明显，过去那种认为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是由外来人群特别是甘青地区原始居民向南迁徙将其带入到藏彝走廊地区的看法是毫无依据的，从根本上难以成立。事实上，从考古文化内涵看，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文化遗存主要从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它与当地新石器文化不仅是一脉相承并相互衔接，而且二者也属于同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也就是说，藏彝走廊地区使用石棺葬的人群主要是当地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后裔，二者在文化上属于同一个人群系统。